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The Kansu-Tibetan Border in the Eyes of American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Missionaries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 Wenwen
Publisher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Chung Chi College
Rights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Chung Chi College, Shatin, Hong Kong
Download date	2026-06-16 21:10:49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774

The Kansu-Tibetan Border in the Eyes of
American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Missionaries
美國宣道會傳教士視野下的甘藏邊界

LI WENWEN

李穩穩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group of missionaries was sent by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C&MA) to the region on the Kansu-Tibetan border. Aiming to gain a deep and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nded preaching targets, the missionaries conducted detailed examin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the local multi-ethnic community, producing a great wealth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hope to establish a firm foothold on the Kansu-Tibetan border—an important gateway to Tibet, the C&MA missionaries adopted some specific tactics and methods based on their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 context of the border reg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ulti-ethnic community and the social struc-

Li Wenwen 李穩穩 is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本研究得到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文化學術研究所駐校研究生獎學金的資助，特此表示感謝。同時非常感謝本文指導老師麥金華博士細心認真的指導和幫助。感謝費樂仁教授、楊紅偉老師、陳聲柏老師、劉繼華老師、郭偉聯老師、聶紅萍老師等諸位師友的寶貴意見。最後，感謝匿名評審專家中肯的修改建議和本文編輯耐心認真的校對編輯工作。

ture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 of the local tribes. Despite all their efforts to thoroughly and meticulously examine the indigenous society, the missionaries failed to genuinely acknowledge the local religion, which was primarily owing to their ingrained objectives, religious stance, and values.

Keywords: C&MA missionary, Kansu-Tibetan border, peripheral society, multi-ethnic community

晚清民國時期美國基督新教宣道會派出傳教士到達甘藏邊界，出於瞭解傳教對象的需要，他們對當地多元族群社會進行了細緻的觀察和記錄，為後人留下了豐富的史料。宣道會傳教士重點關注的是如何在甘藏邊界立足，繼而進入西藏傳教，因而針對其邊緣地帶、多元族群特徵、部落社會結構、宗教建制等方面進行分析，並據此提出了一些具有針對性的傳教策略和主張。雖然傳教士對此區域的社會概況進行了全面、詳細地考察，但由於受到其關懷目標、宗教立場、價值觀等影響，他們始終否定異質宗教。

關鍵字：宣道會傳教士、甘藏邊界、邊緣社會、多元族群

引言

宣道會傳教士稱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為甘藏邊界 (Kansu-Tibetan Border)，這一地帶位於青藏高原的東北部，地理座標約為東經 101–105°，北緯 33–36°，海拔約為 6000 至 12000 尺，人口 350 萬左右，居民主要是農牧民。甘藏邊界主要包括今天甘肅省西南部的卓尼、臨潭、夏河、岷縣等地，以及青海省東部的西寧、循化、隆務等地區。宣道會傳教士於 1895 年初開始在甘藏邊界傳教，是在這一地區傳教的兩大基督教差會之一，它與其他差會最大的分別在於發展的方向不同，宣道會傳教士重視向藏人傳教，其最終目的是希望由此進入西藏。「甘肅境內，藏人區的四周圍都有不同差會工作，而宣道會發現藏區仍未有任何差會開始工作，故

在甘肅的工作特別著重於藏人。」¹ 目前國外學者關於宣道會的研究，主要是從人類學的視角利用傳教士所遺下的資料考察當地的社會狀況，² 或從其他差會的視角研究西北邊疆地區（如甘新大道）的傳教工作，這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有用的借鑒。³ 國內學者多從宏觀的角度入手研究西北地區的基督教，⁴ 或從微觀的角度對個別傳教士展開論述，⁵ 較少從中觀的視角對傳教差會群體展開研究，而對專注藏區傳教的基督教差會——宣道會的研究則多為傳教史實的爬梳。⁶ 在這些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利用中文資料如地方誌和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等進行研究，缺乏對原始資料的大規模梳理。以上的研究成果，為本文的寫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本文擬通過整理

¹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宣道會早期在華宣教史略》（香港：宣道，1997），204。

² Paul Kocot Nietuoski, *Labrang: A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y at the Crossroads of Four Civilizations* (Ithaca: Snow Lion, 1998); *Labrang Monastery: A Tibetan Buddhist Community on the Inner Asian Borderlands, 1709–1958* (Plymouth: Rowman & Littlefield, 2011). Wim Van Spengen, *Chone and Thewu: Territoriality, Local Power, and Political Control on the Southern Gansu-Tibetan Frontier*, ed. P. Christiaan Klieger (Boston: Tibetan Borderlands, 2006). Jonathan Neaman Lipman, “The Border World of Gansu: 1895–1935”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1).

³ Linda Benson, *Across China's Gobi: The Lives of Evangeline French,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Norwalk, CT: EastBridge, 2008); Lauren F. Pfister and Chen Yanrong, “Following the Traces of Christians and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Northwestern China from 1920 to 1936,” *Jian Dao: A Journal of Bible and Theology* 37 (2012): 101–136.

⁴ 陳聲柏：〈近代甘南地區的基督教傳播〉，《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 (2007)；〈近代以來甘寧青地區的基督宗教傳播及其研究〉，載《宗教對話與和諧社會》，陳聲柏主編（北京：宗教文化，2012）；劉鐵程：〈甘肅漢藏邊界的基督教——歷史與現狀〉（碩士論文，蘭州大學，2008）；宗喀·漾正崗布等：《西方旅行者眼中的拉卜楞》（蘭州：甘肅民族，2010）。

⁵ 陳聲柏、王志慶：〈一位外國傳教士眼中的甘南族群關係——埃克瓦爾《甘南藏區邊境文化關係》評述〉，《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 (2010)；陳妍蓉：〈三位女傳教士在甘新大道沿線社會(1923–1936)——以傳教士記錄為中心的微觀研究〉（碩士論文，蘭州大學，2012）。

⁶ 劉繼華：〈基督教宣道會對西北藏族傳教地理格局的形成及其演變〉，《青海民族研究》2 (2011)；〈清末民初宣道會甘肅傳教論述〉，載《宗教對話與和諧社會》，陳聲柏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8）；〈宣道會在中國西北民族地區的宣教事業〉，載《文明交融——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對話願景》，劉義章、李林主編（香港：建道神學院，2012）。

宣道會傳教士與其贊助人的親筆書信、大量的差會英文期刊（即《宣道週刊》，其讀者主要為美國教會信眾）以及傳教士的書稿等資料，來展現傳教士是如何觀察和認識甘藏邊界，並通過何種敘事策略將其所見所聞呈現出來，而這些描述和記錄又對其傳教策略的制訂有何影響。

一、傳教士眼中的甘藏邊界：邊緣社會與多元族群

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宗教復興基督教福音運動的影響下，除了歐洲的一些傳教士外，美國各教派紛紛建立海外佈道組織，由沿海各大城市逐漸向內地推進，繼而在藏族聚居的地區越來越活躍。西方傳教士首先選擇比較容易開展傳教的漢藏文化邊界地帶，甘藏邊界即為其一。在甘藏邊界活動的基督教差會，除了宣道會，還有神召會、內地會、協同公會、安息日會等，其中宣道會和神召會是此地最主要的兩大基督教差會。1895年春，宣道會傳教士來到洮州舊城（今臨潭）傳教，由此開啟宣道會在甘藏邊界宣教的歷史。最早來西北的宣道會傳教士克省悟(William Christie)和席汝珍(W.W. Simpson)⁷曾到蕪湖、北京等地學習漢語和藏語，及後來到甘藏邊界地區的洮州舊城建立傳教站，並由此向藏區腹地推進。

傳教士來華之前對甘藏邊界，甚至於整個藏區的認識都是朦朧模糊的印象，有時連資訊都是相互矛盾的。藏區對於西方人來說一直是一塊「禁地」，被認為是「最後一塊待向上帝開放的土

⁷ 克省悟(William Christie, 1871–1955)，蘇格蘭人，原本信奉的宗教派別可能是蘇格蘭長老會，十四歲在蘇格蘭改宗，移民美國後加入了宣道會創始人宣信 1883 年創辦的紐約福音會幕(Gospel Tabernacle)，1892 年畢業於宣道傳教士訓練所，即被宣道會任命前往藏區傳教。辛普送(W. W. Simpson, 1869–1961)，最初漢名為席汝珍，因「聖靈」問題與克省悟等發生矛盾後，返回美國後加入神召會(Assemblies of God)，並以神召會傳教士身分返回甘藏邊界進行傳教，此後神召會成為在此地傳教的兩大基督教差會之一。

地」，⁸ 這就使得西方世界對於藏區的認識充滿了想像，同時吸引了大批的探險家前赴後繼到達這片被稱為「世界屋脊」的高地。當他們來到藏區之後，發現現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讓人驚喜，如《宣道週刊》中所載：「藏區是一片神秘之土，儘管探索時也許沒有那麼精彩，我們還是禁不住對這個國家和人民以及首領喇嘛很好奇。」⁹ 對於這片神秘之土的興趣，首先表現在對其地理位置的探索，正如克省悟記載的：

西藏東北部的安多省與中華西部的甘肅省毗鄰，也在庫庫淖爾之南，是在西藏康區的北方，但是它向西有多遠我不知道。當地精英把安多分為上多和下多。上多包括安多南部，還沒有傳教士去過。¹⁰

對於這個地區「我個人已經瞭解的是東北部分。我已經穿過了中國西北甘肅省和安多省以及東北的大部分邊界，從西北的西寧到東南的岷州。」¹¹ 由此可見傳教士們認為甘藏邊界是多省交界的邊緣社會，指的是地理位置上的邊緣，漢地與藏區的交接地帶，但是具體範圍，還是模糊不清。

宣道會傳教士來到漢藏邊界，除了地理方位上的朦朧感，也有些許歡欣和嚮往，他們認為：

⁸ Robert B.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The Kansu-Tibetan Border* (Harrisburg: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38), 10.

⁹ “The Palace of the Grand Lama,”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24.7 (1900): 99.

¹⁰ William Christie, “From the Borders of Thibet,”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24.7 (1900): 97.

¹¹ W. W. Simpson, “The Closed Land,”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24.7 (1900): 98.

藏區(Thibet)特別有趣，因為它是佛教的中心地，藏區的達賴喇嘛是四億(four hundred millions)佛教徒的教皇。¹²

藏區(Thibet)的山脈海拔在 8000 至 10000 尺之間，植被茂盛，小溪流淌，滋潤着腳下美麗肥沃的山谷。¹³

這裏風吹麥浪——燕麥、大麥和小麥，草原上牛羊成群，嫣然一幅極美的田園風光。山谷裏野花遍佈，多姿多彩，局部地區草叢已十分翠綠。登高向南遠眺是絕佳的視線，可以看到雪域高原，甚至在八月冰雪已覆蓋山頂。¹⁴

人們非常坦率和開放，有時非常友好……有時兇猛好戰。體格特徵：黝黑的膚色，高顴骨，這讓我想起了美國印第安人。¹⁵

此外，藏民非常排外，懷疑一切陌生人。但同樣藏民有許多好的特性，相比漢人他們更為淳樸，有句諺語叫：「漢人信守白紙黑字，藏人信守口頭諾言。」¹⁶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對於藏區社會的描述，傳教士並不像以往在其他地區的一味刻意貶低，而是一分為二客觀地再現了當地的自然環境和藏民的特性等，然而這或許並非是出自尊重與承認文化多樣性，或更多是以一種美學化、浪漫化的論述策略來書寫其視野下的藏區形象。

甘藏邊界是一個多元族群共存的社會，有漢族人、藏族人、蒙古族人、撒拉族人和土著居民，每一個種族都有其語言。在進行

¹² The Editor, "In Regions Beyond: The Unoccupied Fields of Eastern Asia,"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22.2 (January 1899): 34.

¹³ D. W. Le Lacheur, "Thibet: The Planting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Mission in Thibet,"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21.4 (1898): 74.

¹⁴ C. P. Snyder, "Among Our Tibetan Friends,"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25.14 (1910): 209.

¹⁵ F. H. Derk, "Tibetan Border Openings," *The Alliance Weekly* 62.50 (1927): 824.

¹⁶ William Christie, "The Opening of Alliance Work in Tibet," *The Alliance Weekly* 62.23 (1927): 354.

貿易或物物交換時，他們會選擇使用其中一種語言，儘管族群之間也有通婚，但依然界限分明。¹⁷ 傳教士還敏銳地觀察到洮州的藏人、回人和漢人的異同。藏人身穿羊皮大衣，僧侶披紅袍，有些藏人的住處只距臨潭五里路，所以市上所見多為藏人，集市的噪音比一般中國城市墟場都要大，因為藏人進城不忘手拿念經珠串，口中朗誦禱文，誠足以動人。洮州的商戶多為回族人，其具有阿拉伯人的面孔，性格可用「可蘭經與劍，君可任擇其一」來形容，傳教的方式與信仰一致，非常嚴謹、保守。甘肅人口以漢族人為主，漢人多務農，沉靜苦幹，熱衷於崇拜偶像。這三個民族中，漢族最容易接受福音。¹⁸ 而多民族地區難免會出現各種矛盾、摩擦，甘藏邊界建立的第一個傳教站（洮州舊城）就是以穆斯林起義¹⁹ 為契機建立的，傳教士選擇在洮州（今甘肅臨潭）開始工作，有一石二鳥之利，既可向漢族傳教，又可兼顧藏族工作，他們認為這種複雜的社會形態有利於基督教的傳播。

多元族群的社會為多元的宗教信仰提供了豐沃的土壤，正如克省悟指出的，甘藏邊界的人們信奉不同的宗教，漢人信奉儒教、佛教（漢傳）、道教和許多神秘的邪教，藏族人信奉喇嘛教（黃教或北方佛教）、紅教（另一個較悠久的佛教派別）、巫術和古老的苯教，穆斯林信奉不同的伊斯蘭教派。²⁰ 在多元文化地區，宗教信仰元素的混合雜糅也是其特徵之一，如貴德「南郊西街的小廟裏供奉文昌帝君，藏族人也崇拜他，以前從未見過藏人崇拜漢人偶像。」²¹ 傳教士們還注意到藏區的本土宗教和民間宗教，「在藏區非常流行的惡魔崇拜是最邪惡的」。²² 多元宗教信仰的社會中

¹⁷ William Christie, introduction to *Gateway to Tibet: The Kansu-Tibetan Border*, by Robert B. Ekvall (Harrisburg: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38), 8–9.

¹⁸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204–205。

¹⁹ 指光緒乙未河湟事變。

²⁰ Christie, introduction to *Gateway to Tibet*, 9.

²¹ C. P. Snyder, “The Opening of Kuei-Teh Our New Tibetan Mission Statio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35.24 (1911): 371.

²² V. G. Plymire, “Along the Border and Partly into North-Eastern Tibet (Continued),”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35.25 (1911): 1.

矛盾也極容易產生，傳教士初到保安傳教似乎非常順利，表面上與藏傳佛教地方寺院的關係也相當不錯，克省悟還專程拜訪了夏日倉，並在寺院裏向活佛宣講教義，但當夏日倉弄清楚了其前來的目的是進行傳教後，就拒絕接受基督教，因為他認為基督教只是外國人的宗教。²³ 1899年，傳教士前往保安建立傳教站，但當地藏民不容許外人進入，克省悟曾前往佈道，卻被藏民持刀追逐。²⁴ 在洮州舊城建立的傳教站曾三次被藏民焚燒，有傳教士記載：「僧侶們是一群惡人，對我們很粗魯，當有機會時就會來偷我們的書，扔我們臉上，大聲叫喊說自己不需要耶穌。」²⁵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晚清時期甘藏邊界多元族群地區的矛盾摩擦的存在。

多元宗教的社會中，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間不僅有衝突鬥爭，有時彼此也會結為盟友。比如洮州地區的民眾，不管是漢人還是穆斯林，一定程度上比內地的人們更能容忍和接受陌生人。傳教士發現穆斯林認為自己是這個地方的異域人，是信奉一神宗教的主要群體，他們非常歡迎陌生的傳教士，因為傳教士同樣是只信奉一位神，也不崇拜偶像。²⁶ 穆斯林也積極地為傳教士提供幫助，利用自身與藏民貿易的優勢，提供相關資訊和資料，鼓勵傳教士沿着商路開闢新的傳教站。在對藏族的傳教中，穆斯林發揮的影響最大，「穆斯林軍隊也許為福音進駐喇嘛寺院中心的拉卜楞寺、黑錯寺和隆務寺直接開闢了道路。」²⁷ 「穆斯林軍隊征服這個地區的藏族才使得〔傳教士〕深入藏區成為可能。」²⁸ 由此可見，傳教士借助穆斯林的宗教和軍隊的力量打破了藏傳佛教的密閉圈。同時，傳教士認為洮州的漢人長期接觸外族文化和宗教，對陌生的宗教崇拜和

²³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Alliance*, 1889, 19.

²⁴ 苟希天、任清若：〈甘肅宣道會傳道史〉，《金陵神學誌》11.1 (1925): 84。

²⁵ David P. Ekvall, "Across the Border,"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3.2 (1899): 61. 關於傳教士與當地僧侶、部落頭人以及信奉者之間的爭論與對話，由於目前筆者搜集到的資料有限，故本文暫不作討論。

²⁶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15.

²⁷ *Ibid.*, 144.

²⁸ Elizabeth F. Ekvall, Carol E. Carlson, and Anna Haupberg, "Greeting from the Kansu-Tibetan Border Mission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57.49 (1924): 791.

生活方式比較寬容，比任何一個地方的人們都更友好、更容易接近。²⁹ 漢人是最先接受基督教，也是信徒最大的群體。雖然如此，但穆斯林和漢人本身的信仰又成為傳教士向其傳教的障礙，「他〔指穆斯林〕的信仰對基督教傳教士構成挑戰。」³⁰ 傳教士認為穆斯林信仰非常堅定，之所以接受他們的到來，或許是出於以基督教制衡藏傳佛教的目的，分散藏族人的注意力，減少藏族人對他們的抵觸情緒，為其分擔社會風險；至於漢人是否也有類似的考慮，目前沒有材料證明。但是可以發現漢人對陌生人比較寬容，同時宗教信仰沒有那麼固守，從而傳教士開始利用這兩大群族的宗教信仰和友好關係開展對藏族的工作。

傳教士始終銘記向藏族傳教的目標，故而他們關注更多的也是藏傳佛教和藏區社會。寺院是藏區知識、影響和財富的中心。³¹

喇嘛寺院是藏族宗教崇拜有形的中心，所以藏族寺院中的僧侶是藏族崇拜中積極的人為因素。他們指揮人們，慣常以傲慢的態度完成必要的儀式，並要求相應的物質獎勵，直到大部分的土地財富都集中到其手中。³²

藏民們「非常迷信，信仰非常虔誠，幾乎每個藏人都手持念珠，口裏念着『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他們的手指因為每天撥珠念經留下深深的印痕」³³。另外，信徒們幾乎傾其所有供奉寺院，一般情況下個人是非常窮困的。傳教士們認為這是愚昧無知、迷信以及偶像崇拜，其中僧人犯有欺騙、偽善、驕傲、自私和許多說不出來的罪惡。因為傳教士看到當社會出現動亂或發生戰爭時，喇嘛「似乎沒有能力去阻止，也沒有努力去恢復和平狀態」³⁴。傳教士對於甘藏邊界的異質宗教信仰的貶斥，主要是基於自身宗教信仰的基礎

²⁹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94.

³⁰ *Ibid.*, 142.

³¹ Derk, "Tibetan Border Openings," 824.

³²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169.

³³ Derk, "Tibetan Border Openings," 824.

³⁴ Christie, "From the Borders of Thibet," 98.

來觀察，認為他們落後、愚昧、無知、迷信，由此一方面體現出自身的西方宗教文化的優越性，另一方面為進一步傳播基督教的合法性根基奠定基礎。

傳教士們認為部落社會是甘藏邊界的主要社會形態，分為遊牧和定居兩大類型，部落社會的最高統領是喇嘛。保安這一地區有十二個部落，其中有些部落住在帳篷，飼養大群的馬牛牲畜；有些部落聚居在村落，在溪谷和山坡某些地方耕種。部落的規模從兩三個村莊至十多個不等，村莊也從十幾戶至三百戶不等。³⁵ 每個村莊都有一個頭人，他定期召開會議，與幾位指定的村民一同討論和解決所有地方事務；每個部落都有一個首領，地位在所有村落頭人之上；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首領們都聽命於此地主寺權位最高的喇嘛。³⁶ 有傳教士發現「真正的權力和訴訟事務實際掌握在富有的中年人和年長者中，他們被稱為乾巴(rang-po)，在村落事務中有決定權」。³⁷ 當地人被分為兩個等級：居住在鄉村的人，從事農耕；居住在大草原的人，從事放牧，也從事搶劫冒險活動，而且藏民認為農民的地位是低於遊牧民的。³⁸ 傳教士認為，相較於高原上的遊牧民，定居的藏族農民更是在喇嘛寺院的完全控制之下。另外，部落社會的流動性是非常大的，夏季，遊牧民在草場上放牧，趕着馬牛羊奔跑；冬季，他們會回到海拔較低的冬屋（類似漢人定居的房屋）。正如深入藏區遊牧部落的埃克瓦爾(Robert B. Ekvall)³⁹ 提到：「我們一般會待到十一月初的嚴寒天氣才返回冬屋。」⁴⁰

³⁵ Ibid.

³⁶ Ibid.

³⁷ 羅伯特·埃克瓦爾：〈戎哇與卓巴——甘肅漢藏邊界的藏人定居者與遊牧民〉，宗喀·漾正岡布、劉鐵程譯注，收《中國民族學》，第1輯，楊建新主編（蘭州：甘肅民族，2009），100。

³⁸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176.

³⁹ 羅伯特·埃克瓦爾(Robert B. Ekvall, 1898–1975)，漢名艾明世，出生於岷縣，作為漢藏邊界傳教士中的第二代人，從小在臨洮長大，除母語英語外，漢語（甘肅方言）非常流利。1913至1916年，就學於紐約威爾森紀念學院(Wilson Memorial Academy)，1916至1920年，在維頓學院(Wheaton College)就學，獲得學士學位；1921至1922年，在傳教士訓練中心(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受訓；1923至

傳教士指出部落社會也是非常不安定，戰爭、武鬥、殺戮是非常頻繁和普遍的。如保安附近爆發的一場部落戰爭，持續多年，激烈程度異同，一百多人為此喪生，此次流血事件的原因是偷了一隻羊。「所有這些戰鬥主要原因在於他們自身的性格，妒忌、報復和嗜血成性是安多藏區普通民眾最主要的性格。」⁴¹ 埃克瓦爾認為，從種族上來說，「這個地區〔指卓尼〕的人們是頹廢的種族，不管是漢人還是藏人，都用罪惡搞破壞」。⁴² 特別是當有人抵制、反抗其傳教時，傳教士認為當地的人民「是骯髒的、貪婪的、放縱的人，許多人是殘暴的，坦白說是不道德的，鮮有例外」⁴³。由於傳教士對於藏區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的認識不深，對於藏區發生戰爭以及搶劫偷盜等原因是很難理解的，他們認為「一個昆蟲都不讓人殺的地方，人們卻大規模的搶劫、偷盜和殺戮，這確實是一個謎。」⁴⁴ 諸如此類的疑惑仍縈繞在傳教士的心頭。然而傳教士們發現戰爭有時會成為進一步傳播福音的契機，如「岷州第一批皈依者是穆斯林起義那年的逃難者」，⁴⁵ 此時，傳教士趁機開展救濟、收留難民、醫療佈道等事工來傳播福音。

根據傳教士的記述，二十世紀初甘藏邊界似乎是個經濟凋敝、強盜土匪猖獗、軍閥混戰的地區，為爭奪地盤，演繹了無數的戰爭和殺戮。然而，這些不安定因素往往又給福音的傳播創造了機會，促進了宣道會在甘藏邊界的發展。宣道會傳教士極力觀察和認

1941年，回到中國藏區從事宣教工作，其中兩度回國休假避難；1937至1938年，在芝加哥大學做人類學研究；1944至1945年入伍，此後一段時間為美軍服務，擔任翻譯等職。其父大衛·埃克瓦爾(David Paul Ekvall)，母親海倫·埃克瓦爾(Helen [Galbraith] Ekvall)，叔父馬丁·埃克瓦爾(Martin Ekvall)，是第一批進入藏區的宣道會傳教士。

⁴⁰ Robert B. Ekvall, "Ekvall to Mr. Leonard Hall, 1933-06-26"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92-1-1a, Folder 1, Box 1, Billy Graham Center Archives. 非常感謝美國惠頓學院葛培理中心的 Mr. Bob Shuster 把這些重要的信件寄送給我，特此衷心致謝。

⁴¹ Christie, "From the Borders of Thibet," 98.

⁴²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162.

⁴³ *Ibid.*, 169.

⁴⁴ Snyder, "Among Our Tibetan Friends," 210.

⁴⁵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33.

真總結這一區域社會的特徵：邊緣性、多元性和不安定性，據此，傳教士們制定了一些具有針對性的傳教策略和主張，以更好地實現向藏區傳教的目標。

二、「福音使者」：異質文化與本土文化相遇後的調適

向藏區傳播福音一直是西方基督教差會憧憬的目標，而甘藏邊界所處的地理位置和這一地區獨特的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多文化互存的社會形態，正契合了傳教士們希望以此地作為「跳板」向西藏傳教的目標。這一地區多宗教、多民族、多語言的地域文化特點，有利於傳教士學習當地文化和語言，以滿足以後向四周發展的需要，即向南可深入藏族聚居區甚至拉薩，向西可向維吾爾和哈薩克等突厥穆斯林發展的目標。⁴⁶

據羅腓力牧師統計，在漢藏邊界工作過的宣道會宣教士主要包括曾駐臨洮的克省悟牧師夫婦(Rev. & Mrs. William Christie)、席汝珍牧師夫婦(Rev. & Mrs. W. W. Simpson)、艾自新牧師夫婦(Rev. & Mrs. David Ekvall)⁴⁷、莫大猷牧師夫婦(Dr. & Mrs. Thomas Moseley)、宋昌仁牧師夫婦(Rev. & Mrs. Calvin Snyder)、何佩道牧師夫婦(Rev. & Mrs. Carter Holton)⁴⁸、德文華牧師夫婦(Rev. & Mrs. James Diehl)等。華人同工有苟樂天牧師夫婦，苟牧師帶領家族的四十人信主，其中有五男三女以後成為傳道人；還有曾駐岷縣的宣教士邱理斯牧師夫婦(Rev. & Mrs. Derk)、呂成章牧師夫婦(Rev. & Mrs. William Ruhl)。在保安工作者有德文華牧師夫婦，其餘還有季維善牧師夫婦(Rev. & Mrs. Marion Griebenow)、孫守成牧師夫婦(Rev. & Mrs. Edwin Carlson)、納慈恩牧師夫婦(Rev. & Mrs. Charles Notson)

⁴⁶ 宗喀·漾正岡布等：《西方旅行者眼中的拉卜楞》，22。

⁴⁷ 艾自新或稱大衛·埃克瓦爾。

⁴⁸ 羅腓力先生將 Carter Holton 譯為何佩道，但學術界目前比較認可的是譯為海映光。

等超過二十五位宣教士曾在該區工作。⁴⁹ 華西區的華人教牧領袖除以上提及之苟樂天牧師家人數位之外，先後同工尚有雍克忠、常重生、馮自新、辛保羅、梅葆真、王煥文、王煥章、陳尚志、任清若、魏學濂、孟名世、李壽源、張士明、葛衛道、陳天祥等男女牧師傳道，據稱其中之馮自新、魏鎮魔、孟名世三人後來轉到神召會去工作。⁵⁰

傳教士們針對這一多元族群社會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傳教策略和主張。首先，根據邊界多元族群特徵，傳教士們將傳教對象分為三大主體：漢人、藏人和穆斯林，並分別傳教。在這一邊界東部和北部是漢人聚居區，主要從事精耕細作的農業；西部是藏族農民和遊牧民，農民主要在河谷地帶從事農業，牧民主要在遼闊草原上放牧；而穆斯林主要是散居於漢藏之間的地帶。由於種族界限明確，風土人情、生活習慣、社會禮節均有明顯差異，由此傳教士將其分類，並分別進入不同的族群中進行傳教。「到 1902 年重返西北後，宣道會將傳教士分為兩個工作小組，分別負責藏民工作與漢民、穆斯林工作，當時十四位傳教士有八位專門負責後者。」⁵¹ 傳教士指出，教徒和教堂事工的參加者主要來自漢族，其中有許多識字的人，他們在漢族和社區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傳教士必須依賴的。同時傳教士利用一些漢人的慶典節日（如春節等）開放教堂，開展客房工作。對穆斯林的傳教主要有拜訪清真寺、穆斯林聖者的陵墓和一些穆斯林學校。藏族全民信奉藏傳佛教，傳教困難最大。宣道會 1914 年派遣羅伯特·克勞福(Robert H. Glover)前往甘肅進行調查時指出，藏族民眾對佛教的虔誠是全世界公認的，這也許是他們在藏區傳教遇到的最大困難，而且不斷地有傳教士向漢人聚居區的傳教站轉移，導致藏區傳教人手更加緊缺。⁵²

⁴⁹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212-213。

⁵⁰ 同上，215。

⁵¹ 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359.

⁵² Robert H. Glover, "A Visit to Our Eastern Asia Missions," *The Alliance Weekly* 44.13 (1915): 201, 203.

其次，傳教士們選擇以藏傳佛教寺院為中心，特別是在寺院重大節日以及寺院附近的集市上進行傳教。他們發現寺院和集市是甘藏邊界一個重要的人口聚集地，特別是在藏傳佛教重大節慶時，藏族人為了參加寺院慶典活動，順便到附近的集市購買或換取生活用品，穆斯林和漢族人為了獲得利潤，在藏區集市上收購羊毛等貨物，於是寺院和市集就成了理想的傳教地點。傳教士們極力結交藏區掌權者如寺院活佛或管家做朋友，希望能在寺院建立傳教站。

去寺院〔指黑錯寺〕拜訪是愉快的，也不無機會傳教。當我們靠近新建成的喇嘛寺院中心的大經堂時，晨念剛結束，一些喇嘛剛從裏面走出來，我迅速給他們發了一些〔聖經〕材料。不久更多的僧侶走了出來，我發給他們的材料主題主要是創世記、罪惡和拯救，這些書迅速就發完了。⁵³

另外，傳教士在市集上租下房間，開展客房工作，或直接到集市上去派發單張和小冊子，出售基督教書籍等。傳教士指出，「那裏總是有人會願意聆聽福音。紅袍僧人也許會來鬥嘴和爭論，巫師也許會憤怒鄙視地從旁走過，但是普通大眾〔會〕聚集起來聆聽上帝對藏族的拯救之道，這樣他們便可以瞭解上帝的恩惠。」⁵⁴ 平日的市集也是傳教的一個好去處，「此地〔指黑錯〕的民眾會一月三次到『叢拉』〔即集市〕去做買賣。」⁵⁵

再次，客房佈道與遊行佈道互補進行。甘藏邊界地處高原，冬季氣候極其寒冷，且時間較長，不適宜勞作。傳教士指出，冬季牧民們的日常工作較少，自然轉向宗教活動和貿易。故而冬季主要以客房工作為主，客房工作主要是指傳教士們在集市或街市上租下招待所的房間，免費為遠道而來寺院朝拜的藏民提供住處、招待和娛樂，同時向來到這裏的藏民傳道。傳教士季維善(M. G. Griebelow)指出：

⁵³ S. B. Harrison, "Among Tibetan Buddhist Priests," *The Alliance Weekly* 69.20 (1934): 314.

⁵⁴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175.

⁵⁵ Ibid.

留出一間客房給朋友們娛樂……當他們來到我們住的寺院時，作為朋友，我們會邀請他們來我們這裏，為他們提供食物，也會幫他們餵馬，我們履行了朋友的義務，這樣的接觸也為日後傳教創造了更多的機會。⁵⁶

冬日白天，人們去喇嘛寺院朝拜或到集市上購買生活用品，但是晚上許多人，傳教士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都會來到傳教站……談論這個地方發生的新聞，直到音樂響起，熱愛音樂的藏民們聽到〈耶穌是世界之光〉等讚歌時才安靜下來。⁵⁷

這招待所的工作，實在有助他日向四方擴展工作，因為已有從遠處而來的藏人，預先對福音有了接觸。故而當福音傳到，就不致陌生，且多少有好感，所以這工作的效果深遠。⁵⁸

而夏季正是農牧民忙碌的時節，傳教士認為這是遊行佈道的最好時機，深入牧區回訪老朋友、結識新朋友，面對面交流。因為如果傳教士們沒有定期去拜訪曾來過客房的老朋友或去尋找下一年也許會來客房的新朋友，客房工作將會凋萎減少。傳教士平均每年大約有四個月的時間在牧民帳篷中拜訪。⁵⁹ 在埃克瓦爾從郎木寫給美國贊助人的信中提到，「你看夏季絕大部分時間，我們都是在周邊的遊牧部落中度過的，冬季朋友們來看望我們，這為向他們傳播福音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契機。」⁶⁰ 冬季以客房工作為主，夏季以遊行佈道為主，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補足。

最後，結交有實力的活佛喇嘛、主事或部落頭人對其進行保護。傳教士在中國其他地區傳教，結交地方權貴，的確能給傳教活動及其他行動帶來方便和好處，因為他們可以根據不平等條約獲得

⁵⁶ M. G. Griebenow, "Tibetan Religious Festivals," *The Alliance Weekly* 69.38 (1934): 601.

⁵⁷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185.

⁵⁸ 羅腓力：《宣道與中華》，207–208。

⁵⁹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186.

⁶⁰ Robert B. Ekvall, "Ekvall to Mr. Leonard Hall, 1933–06–26"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92–1–1a, Folder 1, Box 1, Billy Graham Center Archives.

當地政府和官員的保護。而傳教士們發現甘藏邊界的部落社會中是沒有法律的(no law)，且強盜土匪猖獗，部落之間戰爭頻繁，整個地區動盪不安，「就像郎木這樣的地方總感覺很危險，因為沒有條約的保護。」⁶¹ 有傳教士指出，在這些獨立的、直率的 Drag-sgam-na 的民眾中，這樣的權力（護照特權）是不被認可的，傳教士能繼續待下去，是因為有這些保護人的良好信譽和特殊保護。⁶² 在政教合一的藏區，喇嘛寺院掌握最高的權力，「〔黑錯寺〕主事在戰爭時掌控部隊，解決民事糾紛和內部事務，因為這裏沒有律師或法官，他兼任兩者，當我面臨小的困難時他都會很和善地向我解說。」⁶³ 夏河的季維善牧師就與當時拉卜楞的五世嘉木樣家族往來頻繁，並獲得他們的支持，使其能夠立足藏區傳教。傳教士相當熱衷在此地區結交權貴，因為他們沒有任何保障，危機感非常強烈，這不僅關係到傳教事業的發展，更關係到其自身的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

三、結語

晚清民國時期宣道會傳教士在甘藏邊界收效不著，僅有的信眾之中以漢人居多，穆斯林和藏民寥寥無幾。據 1937 年《申報》記載：「拉卜楞有耶穌教堂二所，駐有外籍牧師，在此傳教。教士對於番民情俗，均極有研究，且能操流利之番語，但番人之信教者仍未多見。此宣道會中僅有信徒三人。」⁶⁴ 就像《宣道週刊》上記載的：「然而很多人確信福音的真諦，他們卻沒有勇氣向基督耶穌公開地認罪，除了前些年的兩三個人」⁶⁵，收效甚微。傳教士們通過

⁶¹ Robert B. Ekvall, "Ekvall to Mr. Leonard Hall, 1934-05-23"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92-1-1c, Folder 1, Box 1, Billy Graham Center Archives.

⁶²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164.

⁶³ Harrison, "Among Tibetan Buddhist Priests," 314.

⁶⁴ 莊學本：〈甘青近情掇拾〉，申報圖畫特刊，《申報》(1937年3月18日)：27。

⁶⁵ "Our China fields," *The Alliance Weekly* 69.52 (1934): 832.

親身經歷留下的記錄是研究甘藏邊界非常珍貴的資料，從其獨特的觀察視角反映出當時甘藏邊界社會的另一種面相。

二十世紀初傳教士能夠進入甘藏邊界的重要城鎮拉卜楞地區進行傳教，直接原因在於拉卜楞事件的爆發，他們利用拉卜楞寺被西寧鎮守使馬麒的軍隊佔領這一契機，在當地發展事工。在馬家軍的認可之下，宣道會傳教士在拉卜楞寺附近得以建立教堂，但是他們能夠在這一地區長期地堅持下去，和五世嘉木樣活佛、黃正清等藏區上層人士開放的態度是密切相關的。五世嘉木樣入主拉卜楞後，其父兄對外持開放態度，允許伊斯蘭教、基督教和道教在拉卜楞建立清真寺、教堂和道觀，並為傳教士提供所需物品，「美國傳教士新振華、季維善二名各築樓房一所，所需木料係拉寺供給，每年與拉寺交納房租，寺錢五百一十串，非其購有者」。⁶⁶ 同時，黃正清也從傳教士那裏買一些新鮮玩意：

例如照相機、收音機之類。有的〔傳教士〕要回國，東西要出賣，我們就買下來。我們以七百元的高價買到一架收音機，收聽國外的、南京的以及後來延安的廣播，增長了不少知識，消息也靈通了。⁶⁷

而傳教士之所以能夠入住郎木地區，主要是當地三個部落和兩個寺院（古爾都寺和色曲寺）之間鬥爭的直接結果。當傳教士埃克瓦爾及友人前往古爾都寺說明其來意之後，古爾都寺堪布警惕地告誡他們，自己把其當作朋友、客人，歡迎隨時來做客，但不能長期居住，不能租賃房屋，因為他們帶來不同宗教，這與寺廟的權力和佛的旨意相違背。⁶⁸ 當晚他們前往色曲寺尋求幫助，當色曲寺堪布明白整個過程之後，他不僅同意他們留下，還准許他們使用當

⁶⁶ 張丁陽：《拉卜楞設治記》，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3輯，西北史地文獻第99卷，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104。

⁶⁷ 黃正清口述，師論記錄整理：《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蘭州：甘肅人民，1989），41。

⁶⁸ Robert B. Ekvall, *Tibetan Sky Lin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Young, 1952), 11-12.

地的土地，因為「色曲人和古爾都人之間有仇隙，正因此，色曲寺堪布才答應你可以到河這邊的色曲居住，即使你帶來與我們的文明宗教不同的宗教」。⁶⁹

雖然甘藏邊界上層人士的態度比較開放，但是傳教士們來到之後發現，寺院僧人及普通民眾對其態度依然很排斥，傳教難度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想像。傳教士進入卓尼地區主要是由於卓尼楊土司不敢違逆以蘭州為代表的國家權力，埃克瓦爾在其著作《藏區門戶》一書也有記載：「〔卓尼〕一位年輕的土司由於懼怕漢人權力的入侵或干涉，故不敢公開反對〔傳教士的進入〕，卻施壓給這個鄉鎮的民眾，不准為這些新來者提供一個立足之處。」⁷⁰ 同時，喇嘛寺院的活佛也受到卓尼土司的唆使，建立詛咒塔以及使用不同方式，希望傳教士儘快退出藏區。由此可知，雖然上層人士表面態度是允許其傳教，但下層民眾的排斥態度依然很堅決，一方面與上層人士的施壓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其自身信仰篤深密切相關。

甘藏邊界各地的部落首領及活佛等上層人士對基督教傳教士的開放態度，或許只是一種表象，一種姿態，或許更多的是為求自保而不得已的選擇。如美國植物學家洛克(Joseph F. Rock)於1925年5月進入甘南藏區時，拉卜楞寺的五世嘉木樣活佛已「和他父親一起離開了拉卜楞寺，與一些隨從喇嘛逃到了卓尼土司的領土去」⁷¹，這說明此時期回藏衝突中拉卜楞正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在這次衝突事件中，馬麒作為西寧府的鎮守使，代表着國家權威與合法性，代表着一種國家權力，拉卜楞寺的五世嘉木樣活佛及其家族則代表着一種寺院權力，而卓尼地區的楊土司則為部落權力的代表。當在場的洛克先生問到楊土司是否會參戰時，「他說只要沒有得到蘭州讓他參戰的命令，他就保持中立，但是如果他得到了

⁶⁹ Ibid., 16.

⁷⁰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162–163.

⁷¹ Joseph F. Rock, *Tibetan-Moslem War in West Kan-su*, Arnold Arboretum Archiv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JP. Transcribed RIF19–1t.

蘭州政府參戰的命令，他就肯定會參戰」。⁷²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二十世紀初宣道會傳教士進入藏區的過程也集中反映了當地部落權力、寺院權力及國家權力之間的相互博弈、相互妥協。⁷³

傳教士認為拉卜楞事件的爆發是其進入藏區最有利的時機，「這標誌着傳教工作在藏區東北部的新紀元，因為它意味着我們可以在有漢族勢力的保護下長期在藏區傳教的可能性」。⁷⁴ 就在以上複雜的社會背景中，宣道會傳教士開始了其在甘藏邊界傳教的繁榮時期。傳教士來到甘藏邊界的目的為傳教，故而其觀察著重於此地傳教的優勢，其中對其邊緣社會、多元族群、宗教信仰、部落社會等多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記錄，特別注重藏民的性格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從其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傳教士對於甘藏邊界社會的觀察基本是客觀屬實的，包括對當地社會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的描述，以及當地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社會風俗習慣、部落社會結構等方面。但也有一些不實之處，如對異質宗教的貶斥。

作為神職工作者的傳教士，其根本職責和使命是將基督教的普世主義傳教思想推廣至世界各地，用純淨福音洗滌異教徒的罪惡靈魂或心靈，使基督教成為人類唯一的宗教信仰。因此，傳教士對於異質宗教的批判，完全是出於自身的宗教標準來批判其他民族的信仰，是一種非理性的批判。這更是「心理構圖」⁷⁵ 對人們價值觀的影響，每個社會群體中的個人，都有一種特別的心理傾向，這種心理傾向影響個人對外界情景的觀察，以及他/她如何由過去記憶來印證或詮釋從外在世界所得的印象。傳教士本身有一種心理構

⁷² Joseph F. Rock, *Rock to C. S. Sargent, 1925-06-18*, Arnold Arboretum Archiv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JP. Transcribed RIVaF3-4t.

⁷³ 關於部落權力、宗教權力、國家權力三者之間關係的闡釋，請參見楊紅偉：《清朝循化廳藏族聚居區之權力機制》（北京：高等教育，2015）。

⁷⁴ A. R. Fesmir, "Tibet Open—Forward March," *The Alliance Weekly* 52.13 (1919): 203.

⁷⁵ 「心理構圖」是指個人過去經驗與印象集結所形成的一種文化心理傾向。英國心理學家 Frederick Bartlett 指出，當我們在回憶或重述一個故事時，事實上我們是在自身之社會文化「心理構圖」上重新建構這個故事。Bartlett 對於記憶研究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在人類「心理構圖」(schema)的實驗與詮釋。Frederick Bartlett,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圖，對於他所看到的社會以及景象，自然都會以其已掌握的知識、經驗和印象進行批判，但是如果這種心理構圖本身就有其立場的話，批判其他社會自然都是不公平的，都是帶有偏見的。